



透视

民族灵魂的慧眼

——《呐喊》《彷徨》简论

（中） 王伟强 著

作为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化的

巨著，鲁迅是中华民族的觉醒、

抗争、变革的灵魂。时人给予他

的称号与其为民族做出的贡献名

实相符。当之无愧。他的一生是

深切关注中华民族命运、唤醒民

族觉悟的一生。

辽海出版社

透视民族灵魂的慧眼

——《呐喊》《彷徨》简论

王伟强 著



中

辽海出版社

第四章 鲁迅小说的思想分析

鲁迅“立人”的启蒙主义思想主张，产生的根源是他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民族出路的积极探索。他在躬行自己的思想主张的社会实践中，有过充满热情和希望的尝试，也有过失败的苦闷与颓唐，但无论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处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之下，他都始终如一地从自己“立人”的启蒙主义思想主张出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社会现象做冷静的观察，深刻的剖析，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全方位的艺术观照。“正惟其爱民族越加深至，固其观察越加精密，而暴露症结也越加详尽，毫不留情，……他的创作和翻译约共六百万字，便是他针砭民族性所开的方剂”^①。这些是他的生前好友许寿裳对他一生的社会实践及创作的最精当的评价与概括。

第一节 鲁迅小说与中国的社会革命

一、鲁迅关于辛亥革命的思考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领

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封建主义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政治统治，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在中国历史进步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贡献是巨大的。此后中国历史上围绕复辟与废除帝制出现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二次革命”等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并进行了政权更迭频仍的战乱连年不断的军阀政府统治之中。

辛亥革命这一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影响巨大的政治事件，对鲁迅的影响无论是在其思想上，还是创作上都是重大而深刻的。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积极投身于反对满清政府的民族解放斗争，参加了光复会，从事反清的革命活动。他当时曾亲聆革命先驱孙中山的演讲，拜章太炎为师，与革命志士陶成章、秋瑾过往。这样的亲身经历，使他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都使他无时不在关注中国社会的政治革命。后来他感到革命家们在更多地热衷于制枪造炮，忙于袭击、暗杀，而低估和忽视对中国社会思想改造，即对中国一般国民的国民性的改造工作，特别是通过秋瑾、徐锡麟等烈士的牺牲看到，由于“国民”身受中国封建文化的毒害，为封建礼教束缚和制约，缺乏必要的民主思想和个性意识，革命者的流血牺牲，在“国民”这样的一般社会成员中未引起任何的积极的反响，取得应有的社会效应，日益感到“国民愚弱”的严重性，于是弃医从文，并基于对中西方文化的自觉的比较研究，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的认识，基于对国人民族根性的深刻认识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邃观察与冷静分析，在进化

论思想、人道主义哲学和“超人”哲学等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立人”的启蒙主义思想主张，痛切感到“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还处在愚昧麻木之中，还被封建传统观念紧紧禁锢着自己的头脑，没有广大群众的觉悟，中国的政权变革不会给中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②。从这时起，鲁迅走上了一条形式不同于那些革命家的但同样是为民族解放与发展积极探索的道路。

当辛亥革命到来时，鲁迅和所有的爱国者、知识分子一样，表现了极大的振奋和热情，他当时正在绍兴任教，曾亲自率领学生，上街游行，维持治安，迎接革命军。但是辛亥革命正如鲁迅料想的那样，由于“革命党”没有有效地开展过国民思想解放的启蒙工作，革命的成果不久就因为群众的愚昧而被原来反对革命的封建官僚、地主豪绅们的不折不兵一卒地夺了过去，辛亥革命失败在轰轰烈烈的胜利之中，新的政权仍然执掌在封建主义的统治者手中，中国的国民仍然受着封建主义一如既往的专制统治。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政权旁落，一度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深感失望，曾失去了曾经高涨的革命热情，他曾感触颇深地说：“我觉得革命之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③在失望与无奈中还有着更意味悠远的深刻含义。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邃的洞察及独到的思考，对“国民愚弱”的根柢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对辛亥革命的失败，无论是从理性认识还是从对社会现实的感受，他都有较一般人更为深切的认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打破了封建社

会的建构与格局，但并未从根本上张扬起民主的思想，只是换汤不换药地在传统的封建观念之下，重新构筑起了另一个仍为封建观念支配的政权，或是在社会组织机构上略有不同而已。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鲁迅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结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的认知，特别是对中国人国民性的研究，对辛亥革命这一重大社会事件及其失败做的理性思考，其深、其透，远远超出单纯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或是其他的什么家。鲁迅关于辛亥革命的理性思考，在他的言谈、文章之中都多次表现了出来，他的小说创作，对此也做了充分的反映，而且呈现出独到的特点：即作家把平凡的、琐屑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同深刻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有机地融会起来，把深邃独到的理性思考同自己的炽热的情感结合起来，通过个体社会人的人生悲剧及愚昧无知的“国民”的群体悲剧，展现内涵深刻、意义悠远的社会悲剧、历史悲剧，从而把辛亥革命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悲剧性质及那些在这场社会变革中为民族解放、为民主的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志士的悲剧痛切地表现出来。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从自己独特的人生视角和“立人”的启蒙主义思想主张出发，在对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艺术剖析的同时，把意义重大、内涵深刻的社会主题融入到了对普通人生日常生活场景及情态的艺术观照中，表达了自己犀利独到的社会见解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把对辛亥革命这场社会的、政治的、革命的认识拓展延伸到了思想领域、文化领域，开掘出了认识、理解辛亥革命这一

重大历史事件及其作用、意义、经验、教训的新的渠道。在小说《呐喊》《彷徨》中，作者大致通过四种不同情态的人生际遇的艺术观照，表达着自己对辛亥革命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这四种人生情态分别是：一、为民族民主事业不顾环境艰恶，殊死作战，直至献出生命的革命志士，如夏瑜、狂人；二、对革命毫无认识或快意于个人本能需要或不关心革命与否的一般社会成员，如阿Q、七斤；三、革命前仇视、反对革命，革命后投身“革命”的封建主义者及其附庸，如白举人，假洋鬼子；四、革命前投身革命，革命后被淡忘了的沦为一般社会成员的革命者，如N先生。

在状写革命志士的人生际遇中，作者没有写他们的英勇行为，而是以他们的壮举与社会的反响之间的巨大反差，衬托了英雄们的悲哀。《狂人日记》中作者意在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实质，但也提到了徐锡麟心肝被炒食的残暴，从礼教文化对人精神的蚕食，写到了野蛮、愚昧对人肉体的吞噬。《药》中直接写出了革命烈士夏瑜的鲜血被愚昧的群众作为治病的“人血馒头”的情节，从而在烈士的血肉成了野蛮与愚昧者的口中之食的可悲之中，告诉人们，烈士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不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由此也加深了烈士们悲剧的深刻性。

《头发的故事》是作者对辛亥革命以小说的艺术形式所做的悼念文章，是对麻木不仁的社会形态的愤慨之作。为了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为了民族的振兴与发展，无数的革命者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辛亥革命很快就被人们

忘却了，“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N先生悲愤地说：“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哪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N先生的忿激之词，正是作者对麻木、愚昧无知、健忘的社会情态的愤慨情绪的喷发。

在《风波》中，作者以“皇帝做不做龙庭”的重大社会事件为背景，写了赵七爷挟隙报复、村人们暗自快意，七斤诚惶诚恐，对辛亥革命在中国社会的最低层的影响做了真实的艺术的反映。在封建礼教的毒害与影响下，中国的一般社会成员根本不关心社会政治，只在乎自己的所谓的尊严与体面，只在乎自己的蝇头小利，个人私怨，可谓是勇于私斗，怯于公仇，对如此的国民和由如此国民构筑出的社会情态不做启蒙的思想革命，仅从社会革命虽然可以在形式推翻帝制，剪掉辫子，但绝不会实现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剪掉的辫子随时都可以在“盘”与“放”中进退自如。

《阿Q正传》是鲁迅反映辛亥革命最为全面、最为深刻的作品。在《阿Q正传》中作者对辛亥革命前后成为“革命党”的三种不同社会成分做了精炼的艺术概括。第一种社会成分是以赵太爷为代表的纯粹的封建地主阶级。他们这些在封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平时借助封建势力的政治权势和封建礼教的文化力量，对一

般的社会成员政治、经济、文化上实行着全方面的封建专制统治，在革命到来时，他们对革命充满恐惧。在他们的身上，中国人的民族根性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无特操”这一政治上无立场的虚伪的人格特征。他们为自己的一孔私利，可以无立场、无操守地屈从于任何一个强权集团，然后在保存了既得利益之后，再利用好自己原有的在宗法制度下形成的政治优势、文化优势和社会影响，在新的统治集团中捞取实惠和实力，成为新的统治集团中的新成员。

《阿Q正传》中出现的“革命党”的第二种社会成分是“假洋鬼子”一类人，他们同赵老太爷一样满脑子封建意识，与封建统治阶级保持着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虽然他们剪了辫子貌似“新式人物”，但实际上他们是跻身于以“剪掉辫子”为代表的新式人物之间的封建势力的代言人。这种所谓“新式人物”，尽管受过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但由于他们一直生活在封建主子的襁褓之中，在整个社会没有发生变化，社会思想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意识还顽固地逡巡在民族因循守旧，狭隘保守的根性上，还滞留在传统文化限定的观念形态之中。在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民主思想没有得到传播，民主意识没有成为人们头脑中封建意识的置换物，所以这些剪了辫子的“新式人物”，人们很容易把他们认为是“革命党”。阿Q在革命的时候认识的两个革命党，一个在城里被杀了头，另一个就是“假洋鬼子”钱大少爷。事实上，这些人在取得“银桃子”混入革命党之后，便十

分自然地与赵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合为一处，共同维护他们原来共同拥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和既得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这是一种对一般社会成员极具欺骗性，改变革命性质最为隐蔽的社会成分。

第三种成为革命党的社会成分是以阿 Q 为代表的思想尚处愚昧状态，全无任何理性追求的社会最低层的一般社会成员。他们对革命没有明白清醒的认识，并不知道革命为何物，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只是在革命到来时，他们出于对统治者的诚惶诚恐而欢欣于革命，并藉革命的暴力快意于情欲、物欲本能的满足与需要。这种社会成分虽然占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但他们即便成为辛亥革命的核心接管政权，也不会根除封建制度，只能是再一次实现以他们为核心的政权重组，重建一个新的封建等级机构，实现一次封建王朝的交替。

赵老太爷、假洋鬼子、阿 Q 们这三种社会成分，是封建社会构成的主要成分，他们在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不同的经济成分中，利益上是互相对立的，但在思想意识的观念形态上却在本质上趋于一致。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下，要想实现真正的民主革命，不做“开启民智”的启蒙主义的思想工作，不传播以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新思想，并以之替代人们意识中的封建主义思想，那么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包括辛亥革命这样的社会革命，也难以实现真正的社会进步。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对这一点认识的深刻和独到远远超出了那些革命家们。正因为此，他在小说创作中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分

析和艺术的阐释，使《呐喊》《彷徨》成为中国社会革命不可多得的通俗的文艺读本。

二、夏瑜的革命与阿Q的革命

《药》这篇小说是鲁迅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教训的一个艺术总结。小说中的夏瑜是以“鉴湖女侠”秋瑾烈士为原型塑造的革命者形象。夏瑜为了实现自己的民族解放的革命志愿，在从事革命活动中，被夏三爷——夏瑜的叔叔出卖给满清政府，在狱中，他向牢头宣传革命的道路反遭牢头的毒打，最后被反动的封建官府杀害。夏瑜是一个为解放民众而为民众利益牺牲的英雄，他被捕后的英勇表现及捐弃生命的英雄壮举，是悲壮的，可歌可泣的。但在这可歌可泣的悲壮之中，却内隐着巨大的历史悲剧和社会悲剧。这种悲剧性第一表现为夏瑜的牺牲，丝毫没有引起他所为之捐躯的民众——国人的注意。在民众的眼中，夏瑜的被杀，只是处死了一个囚徒，只为他们的茶余饭后，增加了一份谈资：

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命就是了。……”

凶蛮的刽子手的得意和麻木的民众的好奇融合在一起，正显示着民众的愚昧与无知，为无知者献出生命，这是革命者夏瑜们在中国社会那一历史时期的悲哀。夏瑜悲剧的第二表现是烈士的鲜血竟成了愚昧迷信的民众的治病偏方。为如此愚昧无知和迷信的民众流血牺牲，不为理解已经是一大不幸与悲哀，且死后的血竟被残酷地毫无人道地用来疗治民众的病症，这样生不为民所理解，死后亦可荒唐地为民所用的反差，这是一种用语言难以状写出来的悲哀。在华老栓对夏瑜提供给他的“人血馒头”的过程中，看不到他对革命者或死囚的任何情感表现，有的只是自己获得“人血馒头”的种种得意：

……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

……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

这是作者对华老栓到刑场前后心理状态的描写。从这样的心理情态中，可以看出，老栓与那些“看客”、“茶客”都是一样无知、愚昧、迷信、麻木的精神贫瘠的“愚

弱者”。他不同于看客、茶客的麻木，是对夏瑜这个死囚是他的兴奋点，是他治好儿子小栓顽疾的希望。当华老栓们把治好孩子们病症的希望寄托在“人血馒头”上时，也正把夏瑜们的革命湮灭在了精神贫弱的国民之中。

夏瑜的革命是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要实现“大清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政治理想。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政治理想，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他的牺牲并没有得到民众的理解和认同，仅仅是被人们当做一件新奇的平常新闻而已。如果硬要说夏瑜的献身在民众当中有所反响，那不过是花白胡子们的“气愤模样”和理解不透而产生的眼光“板滞”，最后一致认为夏瑜“疯了”而已。一个英雄，从事的是轰轰烈烈的事业，然而得到的就是民众的不解和死后的鲜血被用作治病的偏方。从《药》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推崇革命者的社会革命的同时，已将中国社会革命的思考深入到了当时为那些革命家们极少重视的思想革命。揭示出了这样的内容：在中国这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度，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封建礼教观念的束缚下，人们没有了自己的思想、人格和尊严，有的只是符合圣贤之道的封建礼教规范的观念意识，没有民主思想，只知道封建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做奴仆的位置，并尽可能地恭顺做好奴才，然后再当好更低层或更弱者的奴才们的主子。像秋瑾、徐锡麟这样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家们，在追求轰轰烈烈，在以暴力革命为革命主要手段的过程中，根本不会静下心来面对冷漠麻木的民众做深入的思想启蒙工作。忽视民众在社会革

命中的作用，不依靠他们这一主体力量，其革命的本身或革命的结果只能被愚昧的民众当做“药用”。

夏瑜的革命虽然是失败的悲剧结局，但好在还没有发展到革命后如N先生（《头发的故事》）所说的“他们忘却纪念”的地步。夏瑜坟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这些尚且表明他的革命和他的牺牲还有继续者，还有纪念者。如果说这“一圈红白的花”是夏瑜牺牲的价值的物质体现和积极的社会反响，那么这种反响的物质强力与巨大庞杂的封建文化体系的吞噬力比较起来，其微、其弱是不成比例的。鲁迅正是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这种不成比例的两种义项，才在他关于中国社会革命的理性思考中更多地强调着“立人”的启蒙主义思想，才在《药》这篇小说中以革命者这一悲剧警策人们思想文化革命的重要，表达了对中国社会革命独到的艺术的理性思考。

辛亥革命是震撼历史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它在中国社会进步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它毕竟因为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而终致最后政权旁落。鲁迅从他“立人”的启蒙主义思想主张出发，在他的创作中一次又一次地阐发着文化思想革命在中国社会革命中的重要性，《阿Q正传》是表达他这一思想更集中、更全面的作品。

阿Q在中国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是最低等级中的一个成员，是在经济上不占有任何财产的赤贫者：

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这样经济情形中的每一个人，都希望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往往出于本能的愿望做出一些与道德规范要求有悖的行为来。阿Q在生计无着，“决计出门求食”的时候就偷了静修庵里的萝卜，又到城里去在偷的团伙里做“只站在洞外接东西”的小角色。维持生存，满足衣食的本能需要，“偷”或“贼”的要领或观念的束缚就退到了第二位或是不再起任何作用。道德这种意识形态范畴中的社会规范只对维系生命的存在有了基本保障或是更宽余者才起作用。阿Q在生计无着时就是这样，绝不再忌讳什么，绝不会再忍受任何观念的约束，只要能有温饱，他就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所以有革命，阿Q就要参加，但阿Q的革命是建立在改变自己物质生存条件的基础上的：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问是“深恶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乌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

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这段文字把阿Q的革命的发动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或言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党就是在国民快意于日常生活中结怨的对方的“怕”与“慌张”中被接受的。这种出自本能“快意”而无自觉意识的行为，必然会因为缺少恒定的理性目标和精神理念的约束而表现出极强的随意性，目标也必然是盲目的。同时，在目标与行为之间，因为没有彼此契合的渠道、方式和方法，而只能是继续在本能的支配下满足物欲的需要。阿Q决意革命，“不知怎么一来，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开始在做随意的革命幻想。“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一个对革命为何物，革命是什么都一无所知，甚至还有的以为“与他为难”的想法的“革命党”，就在追求心理娱悦的幻想中产生了。

阿Q这个“革命党”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他对革命的理解就是对物质的占有，个人私欲的满足：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

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泡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这些流动在阿 Q 意识之中的思维完全是出自生理本能的要求，在人类社会中是正常的社会成员最低标准的要求。阿 Q 这样的社会成员参加革命，如果不做他们的思想的工作，改变他们这种来自满足人生最低标准的要求，那么他们就无异于一个打家劫舍或剪径强抢的绿林强盗。

阿 Q 的革命除却这种来自生理上的物质的欲望、性的欲望上的需求外，还有来自他满足个人自尊心的心理要求。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阿 Q，可以说在未庄是受尽了赵太爷们和闲人们的气，甚至是自己一向瞧不起的王胡、小 D 的气，所以一旦有机会，这口恶气是不能不出的。革命就给了阿 Q 出气争“面子”的机会，阿 Q 在革命的幻想中享受着十足的尊严：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 Q，饶命！谁听他！”

第一个该死的是小 D 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

留几条么？王胡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自己是不动的了，叫小 D 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在这段阿 Q 的美好的愿望中，写了阿 Q 假革命之名行